



曾国藩

生平及家族丛书

张立真◎著

曾纪泽

本传

曾纪泽，系曾国藩子，字劼刚，号梦瞻，湖南双峰人。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十一月初二生于荷叶黄金堂。自幼严受家训，课读经史，稍长，博览群书，尤爱屈原《离骚》。咸丰年间，或随父出走京师，军营，或在家笃学，广泛涉猎西欧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及语言文学。他还刻苦攻读外语，懂数国文字，尤通英文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，湘乡倡修县志，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。曾国藩得知急书制止。他严尊父训，辞去纂修职名，但仍极力举贤荐能，多方筹措经费，为纂修《湘乡县志》出力甚多。

中



辽海出版社

◇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◇

徐 彻 成晓军 高 虹 ◎主编

曾纪泽本传

张立真 著

中

辽海出版社



十七 伊犁交涉

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二日（1880年3月2日）晚，巴黎使馆。

忙碌了一天的曾纪泽办完日间公务，准备稍事休息即应邀前往大客店赴友人穆达宴请时，接到来自北京总署的一份电报，查明电报密码方知朝廷先于正月初三日发出懿旨：因崇厚所议收回伊犁的条约章程“违训越权”，“事多窒碍”，命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，前往俄国“再行商办”^①。重新与俄国定约。

中俄伊犁交涉，是他出使西欧能够享誉中外，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。

常言：机遇可遇不可求。其实，在曾纪泽承袭毅勇侯爵入京陛见候差期间，总署已有派他出使俄

^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九，第3页。



国，交涉有关收回伊犁事宜的意图。但因事情重大，对手纠缠已久，势难驾驭；担心他初出茅庐，经验不足。为慎重起见，遂改由崇厚担当。那时的纪泽不甚理解，心中“郁郁不自得”^①。不意君臣瞩目殷殷的崇厚彼得堡之行，令朝野大失所望，重开谈判收回伊犁的使命，最终落在了曾纪泽肩上。

伊犁交涉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说来话长。

伊犁（今绥定县），是中国西北重要边陲之地，包括惠远、惠宁、绥定、广仁、熙春、宁远，拱仁、瞻德、塔尔奇九城，统称伊犁，相当于一个府。物产丰饶，五业兴旺，地势冲要，是连接中国西部和中亚的主要通道。清王朝统一新疆不久，正式设置伊犁将军，驻扎惠远城，管理全疆军政事务。

咸同年间，新疆地方政局动荡，官吏虐民剥商，引起内乱不休，招致阿古柏外族势力的武装入侵，各种矛盾交织混杂。沙俄蓄意长期强占伊犁，扩大侵华势力，抵制削弱英国的影响，乘机于同治十年夏兵犯伊犁。武装强占后近两个月，才备文通知总理衙门，假意声明替中国“代收代守”。

^①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朋僚函稿卷十八，总第 2763 页。



清政府料定俄国此举“难保没有觊觎要挟”之事，决定命署理伊犁将军荣全从外地驰赴伊犁，会晤俄官收回伊犁城；同时，部署西北各路防务，命景廉、成禄督率所部旗兵规复乌鲁木齐，严防俄人窥伺，“勿落他人后着”，命准军将领刘铭传由陕西入兰州策应。

然而，俄国实无归还之意。俄地方当局盛气折辱中国交涉官员，无端肆意要挟，“惟不提交还伊犁一字”^①。地方谈判受阻，恭亲王奕訢亲自出面同俄国驻华公使协商，计划在北京解决。奕訢提出的交涉方案是“先交后议”。倭良嘎哩一意为俄国拒交伊犁狡辩，公然变本加厉地提出，要求收复伊犁附近的喀什噶尔、玛纳斯等地。

针对俄方的强硬无理态度，为尽快收回伊犁，总署让了一步，表示愿意边交边议，俄方执意坚持“先议后交”定见。继任驻华公使布策竟倡言，塔尔巴哈台、库尔喀喇乌苏两城大路以南及极西地方，皆要由本国武力占据，表现得更为露骨凶悍，与此同时，俄兵不断在伊犁以外地方骚扰，为双边谈判制造新的障碍。疆臣与使臣一脉相承。

^① 《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》，卷八十六，第6页。



翌年七月，俄方又许诺俟关内外肃清，清朝政府军队克复乌鲁木齐、玛纳斯后，“即当交还”。光绪三年，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出师新疆北、南两路，荡涤阿古柏反动势力，粉碎了英俄分裂新疆的政治阴谋，收复伊犁以外的全部失地，地方秩序大定。当总署要求俄国兑现前言时，布策态度恶劣，“仍斤斤以边界案件未办为词”，鸠居伊犁如故。

十分清楚，中国要实现伊犁问题的迅速解决，惟有派专使赴俄谈判一途。四年五月，清廷任命署盛京将军、左副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全权大臣，与俄国政府交涉归还伊犁事宜。

崇厚（1826—1893年），是满洲镶黄旗人，姓完颜氏，字地山，号子谦、鹤槎，举人出身。曾任三口通商大臣、总署大臣。创设天津机器局，仿制洋枪子药，号称谙悉洋务。曾出使法国，代表清廷向“天津教案”死难者赔礼道歉，游历了欧美，枢臣误以为他明了各国大势。协办大学士、兵部尚书沈桂芬特荐举他适称使俄人选。清廷也相信崇厚“向能办事”，对中外交涉情形“亦俱熟悉”，^①才有上述重大使命。

^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廷寄。



十一月，崇厚一行抵达圣彼得堡。俄国政府接待礼仪相当隆重。谈判时，“先以巽词饴之，枝词惑之，复多方迫切以要之”。崇厚名为“知洋务”，实则“软弱无识”，“畏洋人如畏虎”，没有识破俄国伎俩，被对方威势慑服，处境极端被动。

俄方谈判代表格尔斯、布策，以议结边案、赦免回民、中国无意和好等布设陷阱，轮番纠缠崇厚达三个月，却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任何一项要求。前后历经九个月方议定极不合理的伊犁分界图说、商务大略。

总署指令崇厚，伊犁分界“断不可许”，并把拟定核复的分界节略，“飞致崇厚”，令其“通盘筹划”^①。崇厚利令智昏，没有认真清醒地权衡利害轻重，一味沉溺于收回伊犁城的空名，“他们要什么，就答应什么”^②，结果，身陷罗网，不知自拔，而置政府谕令于不顾，对俄国提出的苛刻条件，不审视不熟虑，匆忙于五年八月十七日（1879年10月2

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六，第2~3页。

② 镇江市博物馆：《邵友濂使俄文稿和家书中的沙俄侵华史料》，转引自《文物》，1976年第10期。



日)签订《里瓦几亚条约》后,未经旨准,径自回国。

他收回的伊犁九城,完全是一个空城。伊犁以西、以南的领土全部割让出去,包括通往南疆八城要道、险要,富庶的特克斯河流域。伊犁城被俄国三面包围,“弹丸孤注,控守弥难”,关系到新疆全局,甚至“不如不收之为愈”^①;送给俄国的通商设领特权,是此前经几任驻华公使“力求多年而不可得”者,阻碍华商生计;修改的西段边界、赔款……均“妨民病国”^②。

总之,崇厚所议,不啻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条约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消息传出,激起举国臣民极大公愤,京官、疆臣连篇累牍上书,痛陈条约危害,强烈要求制裁崇厚,废弃条约。西征主帅左宗棠列举了“崇约”于官、于民、于商、于国计的大患;痛斥俄国“我睦邻之谊尽而又尽,彼餍足之道加无可加”^③;怒责崇

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,卷十七,第25~27、1~6页。

②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,卷十七,第25~27、1~6页。

③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,卷十七,第2~6、26、17~18页。



厚“苟安目前”，“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”，今中俄并无战事，却遽议捐弃要地，餍其贪欲，“譬犹投犬以骨，骨尽而噬不止”^①，异日之忧患何极！对崇厚“任其要求，轻率定议，殊不可解”。他主张“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，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”^②。即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，否则，用武力“规复伊犁”^③。

司经局洗马张之洞上疏数十次^④，历数崇厚“误国媚敌，擅许擅归”罪状，举出“崇约”最谬妄不可许者十。张之洞所提十条足以说明俄人“至贪至横”，崇厚允准“至谬至愚”，力主废弃“崇约”，请枢廷不要惧怕改约招致衅端，“必改崇约未必有事，不改此议不可为国”。他提出四条改议之道：计决、气盛、理长、谋定，并“先备后讲”^⑤。左、张奏议，代表了正义舆论的呼声。

在有影响的臣僚中，惟李鸿章反对废约再议。

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八，第2~6页。

②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八，第2~6页。

③ 《新疆图志》，交涉志二。

④ 洗马，是詹事府教读太子的官衔。

⑤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七，第2~6、26、17~18页。



他认为崇厚议约虽“失之轻率”，但他是奉旨有全权便宜行事之使臣，若“先允后翻，其曲在我”，“曲在我悔必自招”，主张接受崇厚所订条约。担心再议更改，俄国必不能允，难保不渐开边衅。中俄接壤万余里，一旦与俄国决裂，防不胜防，“深为可虑”。到那时，恐按现议条件“而不得者”^①。

他认为补救的办法，只好等到换约时，尽量将界务、商务窒碍难行之处酌议更改，如果实在无可协商，界务请左宗棠就近“酌度妥办”，商务采取立法、用人之方，筹划“经久之道”，设法徐缓弥补漏洞，避免重大损失。

但国内舆论义愤填膺，也使李鸿章受到感染，表示同意在御批准之前“据理剖辩”，以期转圜，“杜日后启衅之由”^②。

受正义呼声促动，清廷权衡利害，决定严惩崇厚。光绪六年正月初十日（1880年2月19日），枢廷遵懿旨发出两项决定：照会俄国政府拒绝接受《里瓦几亚条约》；任命曾纪泽充任俄国公使，重开谈判。

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七，第2~6、26、17~18页。

②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八，第25页。



十八 迎接挑战

机遇与挑战并存，对于每一个开拓者而言，都是严峻的历史性选择。机遇本身就是考验，抓住机遇，意味着迎接挑战，力任艰巨，披荆斩棘；反之，害怕困难，畏葸不前，等于放弃机会，眼看着机遇从自己身边溜走。

一百一十多年前，曾纪泽使俄，改订收回伊犁的条约，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样——一个严峻的现实。

“崇约”公布后，“举朝鼎沸”。因此，枢臣疆吏、六部九卿、翰詹科道对改约拭目以待，“企盼以三寸舌折冲樽俎之间”^①，“成议而返”，期望值非常高。一旦改约失败，使节将无颜面见“江东”父老。

曾纪泽是一名刚刚出仕的年轻外交官，臣僚们

^①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朋僚函稿卷十九，总第2791页。



对他出使俄国不甚放心。特别是崇厚滥用头等全权，轻率定约，人们心有余悸，所以，先后有臣僚奏请朝廷不能给予曾纪泽全权定约之权，所议所驳必经总署会同王大臣会议，“谋定后动”，并须让疆臣参与筹议，共拟具体方略，画出框框，令其遵守照办。

詹事府少詹事宝廷的奏折很有代表性。他疏请朝廷要慎重遣使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其理由是，崇厚之所以荒谬签约，“即因遣使不慎”，因而断不可再犯同类错误。曾纪泽行前应回京请训，领会圣意。即使直接由英国赴俄议约，也应选一干才在面奉圣谕后，令其携带国书、谕旨出国交曾纪泽，并“随同参赞”协助谈判。到俄国后，曾纪泽必须随时请旨，“不得专擅”。他还要求总理衙门向曾使发号施令，不得含混其辞。如果将来改约成功，总署与使臣“同功”，如因草率贻误，“总署与该使臣同罪”^①。试图用这些硬性规定和利害关系，把总署与使节绑在一起的办法，杜绝违训越权弊端。

更有甚者，有人竟由怨怒崇厚转而对使节概不

^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九，第4、5页。



信任。翰林院庶吉士樊增祥公开表示反对曾纪泽使俄。他说，曾纪泽“倾心泰西，吐弃周孔”，忘掉了其父遗训；而且，见解偏激，总以为“西人百倍于中朝，西法远逾乎孔教”，必然不能全力争辩改约，甚至会袒护崇厚。要想使后续使者不辱使命，“惟杀崇厚足以儆之”^①，给曾纪泽施加压力。倘若改约不成，他也将步崇厚后尘面临斩监候的厄运。

类如樊增祥的奏折仅仅是个别的。但是，李鸿章等人对曾纪泽完成改约使命的忧虑，并不是多余的。

崇厚身为头等全权钦差大臣，职衔列二品，权位较崇。曾纪泽任公使，属于二等，仅官秩四品京堂加大理寺卿，权限比较崇厚“相去远甚”；况且，曾纪泽直接由海外使俄，未经面圣指授机宜，又差一层，势必会招致俄国轻视慢待。

另外，他以驻英使臣兼任俄使，又给改约增加了一道障碍。几百年来，西欧国家疯狂推进海外殖民政策，竞相掠夺落后国家，矛盾错综交织，互以恩怨结为私交。当时，英国与法国交好，俄国与德

^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九，第4、5页。



国关系密切，西国遣使一向注意这种客观存在的历史关系，忌讳交叉。既然英俄关系向来紧张，曾纪泽同英国交往相对比较频繁，俄国必生几分疑忌之心；围绕中俄争端，英国舆论恰恰认为“崇约”“得不偿失”，俄方正怀疑英国从中搬弄口舌，怂恿中国毁约，因此，李鸿章、郭嵩焘都认为曾纪泽使俄，恐于国事“无益有损”^①，不如命驻德公使李凤苞赴俄办理较为妥切。

事实上，俄国的报复行动正在逐步升级。



崇厚被革职交刑部严加议处谕旨一发表，俄国代理公使凯阳德立即到总署抗议，严厉质询“是何用意”；声称中国制裁崇厚与两国交涉“大有关系”；指责中国“不是真心和好”，俄国使节只好“就走”^②，随即拂袖而去。

俄国政府接到凯阳德报告清朝治罪崇厚的消息，尼古拉二世针锋相对，颁令赏赐与崇厚谈判的驻华公使布策一等勋章一枚。俄外交部声言，中国翻悔前约，议罪使臣，是失信于俄国，新使节到俄后，

①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朋僚函稿卷十九，第4页。

②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八，第11~12页。



必须先立字据方与之和谈云云。

及至崇厚定为斩监候，凯阳德一再以下旗回国，断绝中俄关系相威胁。他声称，“俄国并非无力量，至条约准与不准，在俄国总是一样”^①。英、法、美、德几国公使也以中国凌辱使节，违犯了“公法”，关系到各国颜面为名，联合进行抗议。俄国驻上海领事竟提议举行各国海军联合示威，打击中国的对抗情绪^②。

俄国炫耀武力，海陆并进。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（旧译高伏满），一向在中俄边境挑衅生事，借机蚕食中国边疆领土。他是俄军进据伊犁的实际策划者。“崇约”被拒，考夫曼增兵设防，叫嚣战争。在中亚的俄军骤增至7万余人^③；海参崴一带也在增调军队。六月，邵友濂电告总署，俄海军舰队由海军部头目洛索夫斯基率领开赴日本、中国海域示威。

据左宗棠奏报，俄兵已陆续到达边境，扬言在

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十八，第11~12页。

② 转引自季南：《英国对华外交》，第46页。

③ 一说9万人，见马士：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，第2卷，第366页。



九月内开仗；伊犁、阿克苏、喀什噶尔外卡屯驻俄兵，逐渐撤减，有可能调往东北^①。俄国的武力威胁给中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，曾纪泽如过分强硬，将有激发衅端的危险。

李鸿章担心总署对“崇约”驳议太多，俄国蓄意用兵或变本加厉，谈判必然破裂。认为“彼已到口之食复令吐出是大难事”。他奉劝曾纪泽处今日“第一难处之境”，须“置身家于度外”，效法汉朝通使匈奴的苏武“执节不屈”^②，实则内心对纪泽使俄十分担心。郭嵩焘也说，“此时置议较之从前，其难万倍”。

左宗棠也深知“劫刚所处，尤为不易”，一定责望他成议而返，恐力有不逮，劝告纪泽作两手准备。如果俄国贻其贪欲，能定一公允约章，安定大局，“固为万幸”；若“一味狡执”，理喻情遣俱穷，或者推给边军疆吏，或者离俄复命均可，他愿作使节后盾。署陕甘总督杨昌濬、湘军将领刘锦棠先后接到左帅“暗为准备”的指令，他说，疆吏能预为戒

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二十，第18页。

②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朋僚函稿卷十九，第2791页。



备，使臣可以有恃无恐，“多说几句硬朗话”^①。这是一位爱国老臣的中肯分析和真诚支持。

曾纪泽远在海外，最初，他曾担心崇厚出使前没能到伊犁纵览地势险要，“恐为所欺”。及至崇厚签约回国路经巴黎与曾纪泽晤面，崇厚自信条约“十分周妥”。他当时未见条约内容，不能妄自评断，但愿自己的担心幸而不中，“不愿不幸而言中也。”^②结果真的不幸被曾纪泽言中了。

一接到总署转来的懿旨电报，曾纪泽就预见到此番使命非同寻常。他说，崇厚“善结主国之欢”，尚且不能订立一个公允之约，自己才干不如崇地山，又承乏其后，俄国已经到手的猎获物终难吐出来，“须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，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”^③。比喻得形象恰当。

他致函总署总办官员说，纪泽身当此任，较他人尤难之处有两点。一是崇厚与俄国立约已经签字，吐出较难：

①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，卷二十四，第20~21页。

② 曾纪泽：《出使英法俄国日记》，第262页。

③ 《曾纪泽遗集》，文集卷三，第170、171页。